

深切怀念恩师吴征镒先生

李德铎

(1963~)，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87~1990年就读吴征镒院士博士研究生。

第一次见到吴先生是在1984年的12月，当时我正在西南林学院读研究生二年级。云南省植物学会在昆明举办“植物区系地理、植物分类研究班”，当时吴先生是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兼云南植物学会理事长，他为我们做了“植物区系地理学”的讲座。记得那时吴先生不慎摔伤出院刚4个月时间，但他却在病榻中完成了“植物区系地理学教学大纲”，为此次研究班做了精心准备。会后吴先生以及其他昆明植物所的老师和研究班的学员一道去武定狮子山考察，有很多学员采了不认识的标本就请吴先生鉴定，吴先生总能很快地写出拉丁名。因为吴先生是大家，总被围在人群中央，我那时甚至未能得到与他说上句话的机会。

1986年8月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承担了经济林专业1983级本科生“竹类培养”课程的教学任务。有一天下课后，看到《光明日报》上一则昆明植物所1986年博士生招生启事，不由怦然心动。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准备，实际上是一边上课一边复习，我到植物所参加了考试。考完之后，自己并不是特别有把握，尤其感觉“植物系统学”一科考得不甚理想。刚好同学诸葛仁到植物所看标本，在现在的植物园观叶观果区遇见吴先生，吴先生告诉他我考得不错。大约在12月份，我接到了植物所的录取通知书，荣幸地成为吴先生的第一批博士生。

(一) 吴先生与分支系统学

后来我才知道，直到1986年科学院的植物学科才获准招收博士生。此时吴先生已近古稀，格外重视博士生招生的事情，植物系统与进化研究方向的植物系统学和植物分类学两门课程都是由他亲自命题和阅卷的。印象最深的是植物系统学考卷中的一个名词解释，考试的时候我觉得闻所未闻，但又似曾相识，走出考场后也一直不能原谅自己的无知。回到宿舍，我便开始翻阅资料查找，直至在书架上翻出周明镇先生等1983年编译出版的《分支系统学译文集》，找出“synapomorphy”（近裔共性，即共有的衍生性状）这个词时才恍然大悟。这本书是我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但当时读起来觉得生涩，有些概念就没有记在心里。没想到吴先生如此关注学科前沿动态，着实令我印象深刻。“吃一堑，长一智”。在所里攻博时，我特别关注了分支系统学的发展。当时“分支学派”“表征学派”和“综合进化学派”之间的论争仍很激烈，“Systematic Zoology”（即《动物系统



1990年论文答辩会后与恩师合影



学报》，现在已改为“*Systematic Biology*”）有很多这一类的文章。植物所没有订阅这个学报，我还专程为此到当时还在昆明西郊花红洞的动物所查阅相关文献。我的相关学习心得均体现在我的博士论文“雪胆属（葫芦科）（*Hemsleya Cogn. ex F. B. Forbes & W. B. Hemsl.*）的系统与进化”中。博士毕业留所工作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我于1993年在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雪胆属的研究专著，吴先生欣然为此书作序。其中有一句话“作者还对本属进行了分支系统学分析……可以看出他对近代分类学三大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有了一定的理解……”是对我学习最大的肯定。有趣的是，因为吴先生的影响，诸葛仁在他的硕士论文中也运用了分支系统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了滇桐属（*Craigia W. W. Smith & W. E. Evans*）的系统位置，相关成果发表在《云南植物研究》1989年第11卷第1期上，可能是国内最早运用分支系统学方法研究植物系统的一篇论文。

（二）吴先生与分子植物地理学

吴先生对新学科、新方法的关注和重视，还体现在他对分子植物地理学研究方向的扶持上。1993年，我担任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副主任时，与室主任陈书坤老师一道，向所里提出了建立“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自费）开放研究实验室”的报告。当时我拟了几个实验室的候选名字，但吴先生最终选定了目前的名称。此后，实验室得到所里批准开始运行，也标志着我所植物区系地理研究逐渐转入生物地理学阶段。1995年，在剑桥大学植物系做博士后研究期间，在系里的年度学术交流会上，我就中国西南高山竹类研究的现状和问题作了报告。其间植物系做分子生态学研究的Alison Smith博士专门与我进行了讨论，提出可以运用分子生物学方法来探讨竹子的分类和地理分布问题。在植物园主任Donald Pigott博士的支持下，我到Alison实验室学习分子生物学技术。其间我查阅了相关文献，逐步形成了随着分子系统学和分子生态学的发展，结合分子生物学和我所优势学科植物区系地理学，发展分子生物地理学学科方向的想法。随后我完成了一个相关文字报告，报告通过正在英国访问的李恒老师转交给吴先生。吴先生敏锐地认识到分子生物学对生物地理学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专门与当时的所领导和院资环局领导讨论了通过“百人计划”的方式发展我所新兴学科的问题。1997年，院里将“分子植物地理学”作为新兴学科列入当年的“百人计划”（A类）招聘目录。经过招聘答辩，我成功入选，在所里组建了分子植物地理学研究组。“百人计划”的支持力度很大，当时200万元可谓“巨款”，其中90万~100万的仪器设备费，60万的科研经费，还有12万的住房补贴，可与同期欧美对一个新招聘教授的经费支持力度一比。记得那时我每个月900多元的工资加上1000元的“百人计划”津贴，月收入水平一度竟超过了吴先生本人，由此也引来一些不解，问我何德何能工资比吴先生还高。吴先生对后学的支持和扶持力度可见一斑。

经过全室同事多年的共同努力，中科院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终于在2006年建成。近年来，分支系统学和分子系统学、分子谱系地理学已经成为国内外进化生物学研究的常规手段和方法。抚今追昔，我们不得不感叹吴先生当年的高瞻远瞩和博大胸怀。

（三）吴先生的力学笃行

从1987年2月入师门，到去年6月20日凌晨在昆医附一院见证医院对他最后的抢救，我在吴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了超过26年的时间。起初与吴先生相处，总是仰视并怀着一种敬畏。时间一长，虽然吴先生在我心目中形象依然高大，但更加“多维”了，也平添了一份和蔼可亲。吴先生对学术的孜孜以求，争千秋不争一日更是深深地感染着我们这些后学。1988年，年逾七旬的吴先生带着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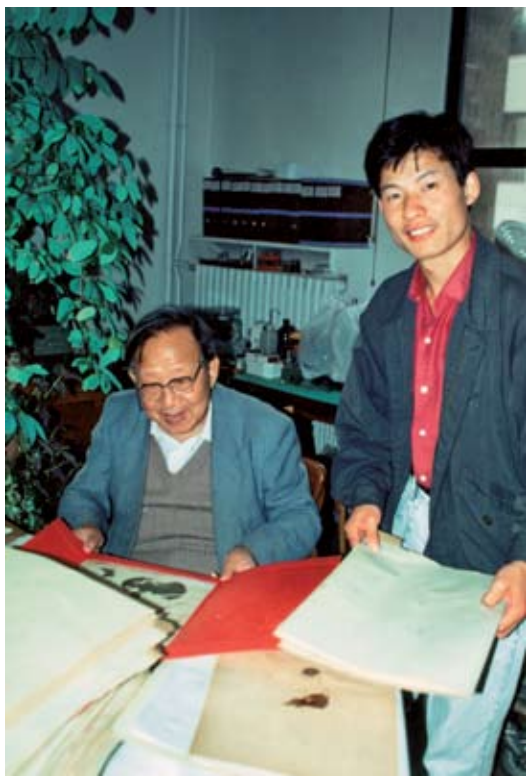


86和87级的几名博士生到滇南和滇西南考察，使我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与他接触。在山上，在途中，除了与他讨论自己的研究课题以外，也会问及一些日常生活和社会方面的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除了植物学工具书外，他手头还会带一些诸如《十月》文学丛刊等一些杂志，也会跟我们闲谈当时流行的电影和他了解的电影明星。当然，他与我们讲得最多的还是自己早年在云南的考察经历，以及对植物学研究的感悟。



恩师与弟子在西双版纳考察（左起：李建强、李德铎、吴征镒、唐亚、朱华）

1992年7月至10月，我作为研究助手，有幸单独陪同吴先生前往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自然历史博物馆、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及奥地利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维也纳大学植物研究所等机构做学术访问和交流。近3个月的朝夕相处，更使我领略到了一位老植物家的学识、情怀和力学笃行。每到一个标本馆，他总是一头扎进紫堇属（*Corydalis* DC.）、蚤缀属（*Arenaria* L.）以及桑科（*Moraceae*）的标本堆里。吴先生自1987年起接任《中国植物志》主编，当时正是编研工作的关键时期。他亲自对相关卷册的编研逐一检查、核对相关标本和文献。时年76岁的他，腿因受过伤也不很利索，但却总要在标本馆工作8小时以上。爱丁堡植物的Martin Gardner曾开玩笑说，你们干脆搬到标本馆来住好了。我那时不到30岁，与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样也习惯晚起，却经常见到吴先生先起床后已在看文献，或整理标本记录。



1992年9月，与恩师在巴黎博物馆Dezoin研究室内查看标本

1996年底我从剑桥回国的时候，吴先生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研究”已结题验收。进入耄耋之年的吴先生，也在历经数十年学术领导岗位的繁忙后，开始如他谦谓的“折节读书”，实则是跨入了于学术上竞放异彩的时期。经过近6年的不懈努力，2002年8月，他的心血之作《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的初稿基本完成。根据吴先生的安排，我参与了第一篇“引论”部分的讨论以及竹亚科相关章节的成稿。2003年12月，约170万字的书稿在科学出版社付梓，但他并未就此止步。那时他的视力日渐下降，每次去看医生时都被嘱咐要减少阅读和写作的时间，他为此烦恼不已。但他克服诸多困难，仍坚持每天工作4~6小时，终于完成了《中国植物志〈第一卷·总论〉》（主要由彭华协助统稿，2004年

10月出版)、《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主要由周浙昆协助统稿,2006年4月出版)和《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主要由孙航协助统稿,2010年2月出版)等专著,了却了一生的心愿。他在写《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一书时,还和我们讨论Croizat的《泛生物地理学》。该书最初的书名也曾考虑过“泛地植物学引论”。考虑到地植物学已有特定的含义,我们建议采用现名,得到吴先生同意。2006年,所里举办了“东亚植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国际研讨会”,恰逢吴先生90寿辰,我们还在吴先生的亲自指导下编辑了《吴征镒文集》,该书于2006年6月出版,其中就有他刚刚亲笔写下的“九十自述”。随后,我们编辑的《百兼杂感随忆》(主要由吕春朝老师和杨云珊负责,2008年9月出版)则刊载了“吴征镒自定年谱”等珍贵文献。



2009年3月,与恩师亲切地拉手交谈

在这些“收官之作”之后,吴先生仍然没有停歇下来。2007年2月,吴先生又接受《中华大典》主编任继愈先生的委托,出任《中华大典·生物学典》主编,不顾年事已高,毅然承担起保存和发扬中华传统植物文化的重任,可谓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去年6月20日后,《云南日报》曾向在吴先生身边工作的几位弟子和同事约稿缅怀他老人家。时值吴先生治丧期间,我的工作任务繁重,只能勉力安排有关事务。27日正式见报的《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一文是彭华(主笔)和我共同署名,但我的贡献确实不多。在吴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所里决定出版《吴征镒先生纪念文集》。我希望抓住这一舒展心怀、纪念恩师之时机,记下这一瓣心香,以深切缅怀先师吴征镒先生恩德。

